

後冷戰時代的美日關係 與東北亞政局

陳文賢*

摘要

東北亞的局勢並沒有因東西方冷戰的結束而趨於安定，南北韓的對峙及北韓可能擁有核子武器的問題，依舊是造成東北亞政局不安的主因。日俄「北方領土」的爭執，亦是兩國進一步經濟合作所必須解決的問題。此外，中共經濟的發展與軍事現代化，使其對東北亞的局勢有一定程度的影響，惟因區域內各國間缺乏一有關軍事安全問題多邊的諮商管道，而加深對無法測知中共未來走向的疑慮。

在上述因素影響下之東北亞局勢的穩定，應有賴美日兩國長期的政經合作所已發展之關係來維繫。除了美日間經貿問題應速謀解決外，美日兩國進一步就東北亞局勢的諮商，並在促進東北亞經濟合作與加強對軍事安全議題的對話方面，採取較為積極與一致的步調，應有助於東北亞的安全與繁榮，則冷戰後的美日關係應比在冷戰時期更具一嶄新的時代意義。

壹、前言

東西方冷戰的結束，使美國解除了來自蘇聯的軍事與政治威脅。雖然有關核子武器的管制仍舊是美國於後冷戰時代在外交及安全政策上首要關注的問題，但是，美國龐大的聯邦預算赤字及對外貿易的逆差，更直接影響到美國整體的經濟及社會發展。同時，美國由於近年來的經濟景氣低迷及遲滯的經濟復甦，使美國在國際事務的影響力上也受到限制。

* 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例如，在經援俄羅斯方面，美國即顯得躊躇不前。因此，柯林頓政府乃以復甦美國經濟為最重要的課題。

日本對美國鉅額的貿易順差、雄厚的經貿及科技實力及其對發展中的亞洲經濟的影響力，使美日關係成為美國在解決經貿問題及調整外交政策時的重要焦點。美日雙方在經貿上的摩擦，甚而影響到兩國人民對兩國整體關係的看法。蓋勒普公司於一九九三年二月及三月間，對美國的意見領袖及一般民眾做了一項有關美日關係的民意測驗，其結果顯示，百分之七十九的受訪的意見領袖，認為日本是值得信賴的盟邦，但是卻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受訪民眾持此看法，而卻有高達百分之四十的受訪民眾持相反意見，同時，受訪民眾中多數認為美日貿易不平衡的問題，主要原因是日方，如日本不願意開放其市場等^①。

東亞國家對於因蘇聯解體及俄羅斯疲於應付政經改革，所可能引發的東亞權力重組，相當的關切。中共在軍備上的汰舊換新、日本在國防安全上的動向、北韓可能擁有的核子武器等，均又是影響東亞權力平衡及安定的主因。從日韓等國均表明美軍對東亞安定之重要性的看法，也反映出，東亞國家對東亞局勢於後冷戰時期，呈現不確定狀態的一項憂慮。

本文主旨即在探討美日關係的持續性及改變，及對東亞政局的影響。探討的重點則包括美日關係的本質及因冷戰結束而帶來的改變，及日本基於美日關係而與俄羅斯及中共的新互動關係。

貳、美日關係本質的改變

二次大戰後的美日同盟關係，基本上是建立在戰後亞洲的權力平衡之上，一方面，美國在其反共的「圍堵政策」下，美日的同盟，使美國在西太平洋的防衛得以延伸至日本，並以日本為「圍堵」蘇聯及中共的一環。另一方面，美國也積極協助日本在戰後的復興工作，特別是在促進日本經濟的振興方面。雖然日本一直被美國視為是其亞洲最重要的盟邦，但是在冷戰時代，美國對東亞的政策，很明顯的是以蘇聯及中共為最重要的對象，從美國、蘇聯與中共的所謂「戰略三角」關係即可看出，

^①"Poll Finds Half of Americans See Japan as Trustworthy," The Japan Times, 10 April 1993, P. 2.

美國在東亞的戰略平衡構想中，日本並未占有很重要的份量。而日本本身受制於其「和平憲法」的約束，在國際政治上一直保持低姿態，並跟隨美國的政策。在軍事安全方面，雖然美日於一九五四年簽訂安全互防條約，事實上，是日本一直處於美國的核子保護傘下。美日同盟非但使得日本有了國家安全的保障，同時也讓其產品得以進入廣大的美國市場。

冷戰的結束及蘇聯的解體，使美日同盟的軍事意義頓為降低，而在冷戰時代，由於美日對軍事安全事務的重視，致使雙邊經貿衝突的重要性並沒有特別受到重視，甚或被刻意貶抑，導致美日對此問題的長期疏忽，且始終未能制度化的加以商討解決。因此，日本對美國每年鉅額的貿易順差，遂逐漸成為美日關係的絆腳石。經貿上的摩擦，更加深對美日關係各種不利的揣測，例如日本經濟侵略的陰謀等，更增加了美日兩國人民情緒化的互相指責，美國人認為日本一直在其國家安全方面享用「免費搭乘」的服務，意即美國要為日本的國防負擔龐大的費用。並指責日本應負起防衛本身的國防負擔。而日本人則認為，美國人不應把其經濟情況的惡化歸罪給日本，應設法解決其國內的財經困難及社會問題。

總之，冷戰的結束，卻暴露出美日兩國對雙邊關係缺乏一較長遠及整體諮商的缺失。而美日兩國在經貿依賴程度加深的情況下，有關經貿方面的齟齬，原應由雙方投下足夠的人力與資源，做最有效、最迅速的解決，以免其它領域的合作關係受到影響，但是，美日兩國在解決兩國的經貿問題上似乎欠缺這樣的共識與安排。誠如葛雷士丁 (William H. Gleysteen, Jr.) 所言，影響美國人生活及國家安全至深且鉅的美日關係，美國人竟缺乏認真及嚴肅考慮此問題的態度。他並認為，與日本關係惡化可能帶來的成本代價及危險性，均值得美國人對此問題加以認真思考^②。而美日關係的本質，也由日本在軍事安全上單方面的依賴美國，變成美日在經濟上既合作又競爭的互賴關係。

參、美日外交關係的分水嶺

一九八九年八月伊拉克侵略科威特，引發以美國為主的聯合國部隊制裁伊拉克的波斯灣戰爭，此役可能成為美日外交關係上的分水嶺。如

^② Willian H. Gleysteen, Jr., "East Asia," in Nicholas X. Rizopoulos, ed., *Sea-Change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a World Transformed* (New York, N.Y: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0), P. 45.

前所述，日本於冷戰時期，外交上配合美國對蘇聯及中共採取的「圍堵」政策，即便到了一九八〇年，卡特總統因蘇聯侵略阿富汗，而要求西方國家抵制莫斯科奧運會，也只有日本與少數幾個西方國家積極響應。但是，波斯灣戰爭卻提供日本重新思考其「獨立」外交的機會，原因如下：

1.日本捐出了一百一十三億美元支援聯合國部隊，僅次於科威特及沙烏地阿拉伯，但卻沒有得到西方國家應有的重視，反遭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對日本的參與不夠積極的批評。日本有七成以上的原油是由中東地區輸入，美國人自然認為伊拉克的侵略行動是危及日本的國家利益，但是日本卻必須在西方國家強烈的責難及壓力下，才願承諾援助聯合國部隊，同時又顯得錙銖必較。因此，在波斯灣戰爭之後，美國人認為日本在國際危機時的可靠性，有加以重新評估的必要。日本則一方面也覺得在資金支援之外，必須派遣人員予以支援，以增進國際間對日本的善意回應，另一方面，由於國際輿論的壓力，日本乃擴大解釋憲法，派遣掃雷艇至波斯灣，協助清除伊拉克所鋪設的水雷^③。而日本此舉也為日後通過「聯合國和平行動合作法案」，使日本得派遣自衛隊參與聯合國維持和平的行動鋪路。

2.雖然日本的外交一直被批評為「支票本外交」(checkbook diplomacy)，但由於美國無法單獨支付龐大的軍事費用，使日本感到美國國力的衰退，而更進一步質疑美日安保條約的可靠性。與日本政府關係密切的「全球和平國際研究中心」(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Global Peace)，於一篇討論日美關係的報告中即指出：「很明顯的，美國經濟並沒有復甦，而美國處理外交策略的能力也在減退。例如，美國沒有能力負擔波斯灣戰爭的全部費用。美國人民及政策制定者似乎拒絕承認美國的衰退及需要改善。假如整個美國政治系統不加以改革，則不合邏輯及無效率的預算過程可能持續下去。」^④

事實上，日本對於美國能否信守它對日本的安全承諾也感到擔心，根據美國的日本問題專家賴孝和(Edwin O. Reischauer)所言，日本早在一九七〇年代初期已有此項疑慮，主因乃在於美國逐步自越南撤軍及黑白種族的衝突與反越戰而導致美國社會的不安。同時，尼克森總統對中共外交政策的轉變亦未預先通知日本。而季辛吉國務卿所倡導的包括日

③詳見張隆義，「日本自衛隊與海外派兵問題」，問題與研究，三十一卷十二期（民國八十一年十二月），頁一二至二四。

④Quoted in Carla Rapoport, "The Big Split," Fortune, 6 May 1991, P. 27.

本為一邊的世界五邊權力平衡論等，在日本看來，均是以犧牲西歐及日本利益的權謀運用。因此，日本深恐被捲入美國的「軍事冒進」的政策中，遂在日本國內引起有關日美同盟的辯論^⑤。然而，美國仍認為與日本發展更密切的關係將是維護美國的戰略與政治利益所必須，但美國從越南撤軍在亞洲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則一直須等到經歷一九七〇年代及一九八〇年代，美日雙方在經貿及文化交流上有了更密切的關係後，才克服日本以往認為美國從亞洲撤退的這種看法。而美日在戰略關係方面，也有顯著的進展，兩國甚至加強在海軍聯合演習方面的合作^⑥。

然而，波斯灣戰爭也對美日關係造成一些衝擊，美日經貿競爭所造成的嫌隙，也因波斯灣戰爭兩國間的協調不夠而更形激化。例如，日本眾議員石原慎太郎即強調美日關係並不平等，他舉出美國政府在對日貿易政策上所採取的排除「結構障礙行動」(Structural Impediments Initiative) 即為一明顯的例子，因為美國在此一政策架構下，提出兩百多項目要與日本討論以期解決雙邊貿易問題，反映出美國不顧日本的社會及文化特性^⑦。

日本在自主外交方面的努力，似乎在蘇聯解體後，顯得更為積極。一九九一年秋，日本致力於在聯合國贏取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目的乃在使日本於國際事務上有更大的發言權，而日本此項努力，亦可視為日本欲逐漸擺脫美國外交政策影響的例證^⑧。同時，日本與美國、中共及俄羅斯爭取對東亞國際事務的影響力，似乎也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趨勢。但俄羅斯面臨政經改革的困難，短期內是否仍有餘力競爭，值得觀察。而中日間的競爭卻可能因為地緣的關係而大為增加。因為歷史的因素，日本在這方面的阻力自是不小，因此，日本在調整其對東亞強權及亞洲鄰邦的外交策略上，仍有藉助於其經貿力量的地方，同時尋求並強化彼此間的溝通與了解。日本更應藉各種雙邊及多邊關係表明日本欲更積極參與並履行維持國際安定與和平的責任。

美日關係則為日本為達成此一外交目標，在目前的國際環境下，所必須的資產。美國的繼續參與亞洲事務可減少日本為實現其外交目標的

⑤Edwin O Reischauer, *The Japanese*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353.

⑥Richard Holbrooke,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Ending the Unequal Partnership," *Foreign Affairs* 70 (Winter 1991/92): 46.

⑦Ibid, P. 47.

⑧Ibid, P. 51.

阻力，畢竟美國以其軍事力量及提供亞洲國家以龐大的外銷市場，在東亞的軍事及經濟事務方面自然擁有嚇阻的力量及談判的籌碼，對維持東亞局勢的安定，也自有深遂的影響力。

肆、東北亞的新形勢

一、美軍駐日韓的新意義

美國在日本的駐軍，雖然人數已減至四萬七千名，同時也可能於可見的未來進一步的刪減，但是卻可能是美國於後冷戰時代顯示其仍要積極參與亞洲太平洋地區事務的主要象徵。而在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國際政局未明之前，美國應不會急於從此地區撤軍。雖然美國的國防預算也因冷戰的結束，及對於重要問題的優先順序及經費有所調整，但是因為日本近年來已負擔駐日美軍於日本本土內所需費用的一半，約三十億美元，已超過美國的任何盟邦對駐該國美軍所擔負的財力，對美國而言或可說是以最少的成本獲得最大的效益。而根據美日間的協定，到一九九五年，日本將付到四十億美元，幾乎是占駐日美軍非薪資費用的百分之七十三^⑨。其次，多數的東亞國家似乎都樂見美軍之繼續駐紮亞洲，認為是穩定亞洲政局所必需，這些國家的政治領導人物擔心，一旦美國急速從亞洲撤軍，可能導致此地區的權力真空，也可能因此而引發強國間的軍備競賽，而導致東亞的不安定。

因此，美國駐日、韓的軍隊，對於後冷戰時期的東亞國際政治，具有多重的戰略與政治意義。駐日、韓的美軍，固然時因經貿的問題而成為美國與日、韓間的爭執焦點，特別是在分擔費用的問題方面。但是日、韓對美駐軍問題，卻也逐漸產生一項共識，即美軍的繼續留駐可為穩定東亞政局的支柱，惟日、韓各有盤算，日本認為美軍的續留可平衡中共與俄羅斯在此一地區的軍力，甚至可防韓國的不友善行動。而韓國則認為，美軍的續留除可嚇阻北韓之南侵外，亦可減低日本因安全考慮而擴張軍力的需求。中共的想法則很接近南韓的想法。中共雖然在原則上反對美軍留駐日韓，諷刺的是，中共最擔心的，恐怕莫過於因美軍的撤出日本，而迫使日本為尋求獨立自主的國防而走向發展核子武器之途^⑩。

⑨Edward W. Desmond, "Venturing Abroad," *Time*, November 2, 1992, P. 20.

⑩Kishore Mahbubani, "Japan Adrift," *Foreign Policy* 88 (Fall 1992): 132.

中共的介入調解美國與北韓有關國際原子能總署檢查北韓的核子設施之爭執，或亦有這一層面的考慮。美日安保條約原受到中蘇共的抨擊，但中蘇共於一九六〇年代末期及一九七〇年代初期的交惡後，即停止對美日安保條約的譴責，因為雙方都擔心，若無美日安保條約提供日本在安全上的保障，日本可能為尋求一己的安全而倒向對方，或是日本重整軍備，而上述這些情況，都不是中蘇共所樂見^⑪。

日本一方面不願見到中共成為東亞的霸權，另一方面，日本在美國漸無法負擔龐大國防經費的情況下，逐漸對美國對日本安全的承諾感到憂疑。因此，日本最終走向發展獨立的國防可能會是一不可避免的趨勢。但日本朝此方向的努力並想在國際安全事務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有兩大必須克服的難題。一是內政上的，即有關如何使日本在發展獨立國防上，於國內形成共識，避免導致憲法危機或違反日本所聲明的反核三原則。日本首相細川護熙即言冷戰時代的美蘇兩極國際體系也使得日本國內政治形成兩極^⑫。一是外交上的，亞洲國家，特別是二次大戰時，曾受日本侵略之國家，必對日本的重新武裝感到憂慮，日本則必須化解其亞洲鄰邦及東南亞國家的這項憂慮，以避免引發此一地區的軍事武力競賽。

基於上述內政與外交上的難題，或許值得日本嘗試的是，探討集體防衛與集體安全的可能性，使各國不必浪費寶貴的資源在國防及軍事上。藉此發展一個新的國防概念，及新的世界秩序理念，而其中各國在經濟與環保等方面的合作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如此，日本不但可繼續透過經濟的實力來增強其在國際事務上的影響力，同時也符合日本一貫主張的和平策略。一方面可釋東亞各國對日本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的疑慮，另一方面，一個堅持世界和平的新日本強權，也較易為國際所承認及接受^⑬。在日本漸朝此方向努力的過程中，中共、俄羅斯及美國仍會是日本走向更自主外交所需要進一步加以溝通的最主要國家。

^⑪Reischauer, *opcit*, pp. 350-354.

^⑫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1 May 1993, P. 4.

^⑬Yoichi Funabashi, "Japan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Foreign Affairs* 70 (Winter 1991/92): 65.

二 日本的「睦鄰政策」

日本明仁天皇伉儷於一九九二年十月訪問中共，即是日本展開睦鄰外交的一大策略。日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及其間，對中國侵略所造成的傷害，既深且鉅，戰後又受制於東西方的冷戰，日本對中國人民因日本的侵略所受的創傷，也未曾正式的表達歉意，而日本天皇的訪問中國大陸，及所發表對過去日本帶給中國人深重苦難時期而深覺傷痛的致答詞，顯示日本希望藉天皇訪中共之行，有助於化解中日間的這一段歷史情結。

日本於冷戰時期對中共的政策幾乎均以美國馬首是瞻。但是由於冷戰的結束、中日地緣及歷史關係等，均使得日本對中共外交也亟欲嘗試「獨立自主」的路線。而美日在對中共政策上常無法步調一致，更促使日本衡量各方面的利益，而調整對中共的政策。一九七〇年代初期，美國擬打所謂的「中國牌」以對抗蘇聯，尼克森總統於一九七一年七月宣佈訪問中共的聲明，卻未於事前通知日本政府，帶給日本相當大的衝擊，因此尼克森訪問大陸的聲明甚至在日本被稱為「尼克森震盪」(the "Nixon Shock")。日本認為，日本在「中國問題」上，長期與美國站在同一條戰線上，但美國總統決定訪問中國大陸如此重大的外交決定，卻未周知日本，更遑論與日本諮詢。一九七二年九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中共，並搶在美國之前與中共建交，或可視為美日對中共政策存在重大歧異的明證^⑭。

此外，中共於一九八九年六月派軍隊武力鎮壓在天安門前要求改革的學生示威運動，引起國際上廣泛的關切及譴責中共武力鎮壓之手段。但是日本首相海部俊樹，卻於一九一九年八月訪問中共，成為天安門事件以來，第一個訪問中共的工業化國家領袖。此亦可顯示日本因戰略、經貿利益的考量與西方國家不同，而導致日本甘冒西方國家之責難，而未持續與西方國家採取一致的立場。

中國大陸豐富的天然資源、人力及廣大市場的潛力，均使日本不得不在對中共的政策上採取較西方國家更為審慎的做法。日本與中共之間的貿易額，從一九七三年中日關係正常化時的十一億美元增加到一九九一年時的二百二十八億美元（其中中共對日出口額為一百四十二億美元，

^⑭ 同註^⑪。

進口額為八十六億美元)^⑯。日本也深刻了解中國大陸的不安必定不利於日本的國家利益，除日本的經濟發展可能受到影響外，不安定的中國大陸可能導致大量難民外流的問題，亦非日本所願見。因此，日本在中國的經貿活動，其戰略方面的考慮似乎並不亞於經貿利益的考量，特別是共產主義在蘇聯的崩潰及因此而衍生的各項政、經問題，更使日本體認協助中共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也因此有日本人認為「中國之於日本，就如同蘇聯之於歐洲」^⑰。

日本對美國柯林頓政府要求中共改善人權的強硬態度，亦感到憂慮，認為美國此舉可能激發中共反改革勢力的反撲，而使得中共改革派的經改政策受挫，連帶影響中共政局的穩定。日本主張採較溫和的對策，特別是從給予中共的經援及協助經濟發展方面。日本於一九九二年給予中共五億多美元的經援。同年，日本亦開始支付允予中共計五十八億美元有關能源發展貸款的第一筆款項，而日本在勸說中共簽署「禁止擴散核子武器條約」上亦有所貢獻。其他，諸如中共同意遵守主張限制遠程飛彈科技輸出的「國際飛彈科技管制協約」(the International Missile Technology Control Regime)，及中共同意限制供應赤棉的武器等，日本亦發揮了一定的影響力^⑱。

三、日俄關係的新契機

日本與俄羅斯關係的難以突破，「北方領土」的爭執，仍舊是問題的癥結所在。日本於一九五五年即計劃要求蘇聯歸還於二次大戰後自日本占領的日本北方四小島（澤捉島、國後島、色丹島及齒舞），並召開國際會議以決定南庫頁島及千島群島的主權歸屬問題。日蘇於一九七二年簽訂和約，終止兩國的戰爭狀態，但蘇聯仍拒絕歸還四小島，因此影響到和約的進度及其真正的意義。對於「北方領土」的問題，日本一直秉持一九五一年日本參與舊金山和會，其首相吉田茂的聲明，即日本不同意蘇聯對占領日本這些島嶼的說法，並認為，即使對於澤捉島及國後

^⑯張隆義，「日本天皇中國大陸之行」，問題與研究，三十一卷一期（民國八十二年一月）頁七四。

^⑰Louise do Rosario, "Tailored to Fit,"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October 22, 1992, P. 52.

^⑱同註⑨。

島之屬於日本，連沙俄政府都沒有表示異議^⑯。

一九九〇年，蘇聯總統戈巴契夫主政，主張開放、改革，受西方國家的肯定與支持，但在此領土問題上，蘇聯仍拒絕退讓。日本對於俄羅斯進行經濟改革所需的經援，由於領土問題的爭執，一直都顯得不夠熱衷，並引起美國、德國等國家的批評。日本首相宮澤喜一於一九九二年七月在華盛頓與布希總統的會談中，仍舊重申以俄羅斯歸還四小島做為日本經援俄羅斯的條件。雖然俄羅斯總統葉爾辛於一九九二年九月宣稱，願意與日本談判解決此一領土糾紛，但是由於日本以俄羅斯歸還北方小島做為援俄的條件及俄羅斯國內反對聲浪大，此問題還是懸宕未決。

俄羅斯所面臨的經濟危機，已使主張改革的葉爾辛總統受到保守勢力的挑戰與反擊，若西方國家未能及時的予以經援，俄羅斯的政局能否維持穩定，殊難逆料。果如此則西方國家的安全與經濟必將受到重大的影響。也因此促成柯林頓與葉爾辛於一九九三年春於加拿大溫哥華的高峰會談，而柯林頓也於會談中表明支持日本在領土問題上的立場。日本可能基於上述的原因，才同意暫緩與俄羅斯商討有關四小島的歸還問題，日本前外相武藤嘉文於一九九三年四月間在東京舉行的七大工業國外長及財長會議的前夕，宣佈此項擱下援俄以領土爭執之解決為條件的連鎖政策，而視俄羅斯的民主改革為目前更迫切的問題，並應允對俄提供十八億美元的經濟援助^⑰。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俄羅斯的大選，高舉極端民族主義旗幟的自由民主黨贏得了將近四分之一的選票，成為反葉爾辛的主要勢力。俄羅斯的政局走向，無疑地將影響美日與俄國的關係整個東北亞的情勢，也勢必連帶的會受到影響。

四美日合作的新架構

美國前總統尼克森認為，對美日關係最大的威脅不在安全事務方面的爭執，而是在經濟方面的對抗^⑲。而東西方冷戰的結束，頓使美日間的經貿問題顯得更為突出。而美國在外無軍事及意識型態的威脅，使得本身的經濟問題，如龐大的政府預算赤字及對外貿易逆差，因影響國力

^⑯Kenichi Ito, "A Japanese View of the Kurile Disput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ember 6, 1993, P. 6.

^⑰James Sterngold, "U.S. in Policy Shift on Japa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pril 4, 1993, P. 1.

^⑱Richard Nixon, *Seize the Moment* (New York, N.Y.: Simon & Schuster, 1992), P. 156.

及人民的生活至鉅而為柯林頓政府認為是項最需迫切解決的問題。一九九二年日本對外貿易順差總額達一千億美元中，對美貿易順差即占了將近一半，約五百億美元。

近年來美國經濟的衰退，使得美國前總統布希不得不於波斯灣戰爭結束後，即率美國數家汽車公司的老闆及其他企業界人士訪日，期望能突破美日的經貿關係，但並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反而在美日引起廣泛的批評。美國大報如紐約時報及華爾街日報均撰文批評布希像兜售汽車的商人之不當，而完全不像一個準備領導後冷戰世界的領袖。但是布希仍得到日本宮澤首相的支持，應允盡力促使日本經濟復甦以增加自美進口。而美國柯林頓政府也表示解決美日經貿問題的決心，國務卿克里斯多福認為美日必須更廣泛及深入的探討經濟問題以維持並拓展美日間的合夥關係，他並認為沒有任何雙邊關係會比美日關係更為重要^{②1}。

保護性的雙邊貿易協定或區域性經濟集團均不利於美日的經濟利益，美日兩國除了應對兩國間的貿易摩擦加以妥善解決外，亦須加強合作並落實烏拉圭回合談判所達成的協議。以促進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繼續發揮其為世界自由貿易體系的功能，以強化該協定日後發展為多邊國際貿易組織的基礎。

美日兩國在安全方面的合作，也必須有不同於冷戰時代的觀念及做法。以日本在世界上的經貿力量，國際間要求日本更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的期望自會提高，而日本基於國家利益及國際地位的考量，參與的意願也會提升，而美國在導引美日關係的發展方向上仍具備一些有利的條件，特別是在協助日本在主要國際組織內享有更大的發言權方面。日本於一九七〇年代初期，已有取得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席位的意願，美國雖表贊同，但並沒有積極地促成。由於此事牽涉到聯合國憲章的修改問題，恐需一段時日，因此有些美國學者主張，美國政府應可開始並更積極的在這方面協助日本^{②2}。此舉當亦有助於落實布希總統及海部首相於一九九〇年春宣佈的美日兩國「全球夥伴關係」(the U.S.-Japanese "Global Partnership")的合作原則。

由於歷史的因素，日本想在後冷戰時期以軍事強權出現而為東亞各國承認及接受的可行性不高。因此，美日兩國均有人建議日本可朝成為

^{②1}同註^{①9}。

^{②2}Kenneth Dam, et al, "Harnessing Japan: A U.S. Strategy for Managing Japan's Rise as a Global Power,"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16 (Spring 1993): 40.

「世界文事強權」(the Global Civilian Power)而努力。日本成為非軍事方面的強權，一方面可以符合其「和平憲法」的精神，同時也較不易引起東亞各國對日本強化軍事力量的疑慮。另一方面，日本更可善用它在經濟與科技方面的實力，或許亦有助於建立一個基於財經實力的新世界秩序^②。特別是一九九三年在西雅圖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已進一步建立起亞太國家追求經濟安全的共識。而日本將加重其在此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殆無疑義。

伍、結論

美日兩國生產總值的總合約占全世界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四十。日本已取代美國成為提供外援最多的國家，同時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債權國；而美國在蘇聯解體後，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軍事超級強權。這些事實，使得美日關係的發展與亞洲的軍事、經濟安全息息相關。

基於歷史的背景，特別是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在亞洲的侵略行動，使日本想在國際政治舞台上亦享有其在國際經濟上所展現的實力與地位，有更多必須加以克服的困難，而睦鄰政策應是日本步向「獨立自主」外交的第一步，日本首相宮澤的東南亞國家訪問及日本天皇的大陸之行均可為此提供一註解。而日本參與聯合國和平部隊在高棉的工作，更是日本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並改善其國際形象的最佳途徑，對日本欲實現於一九七〇年代即想擁有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的目標，應有所助益。

美日關係的改善與加強，將有助於提供東亞各國一個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安定環境。至於在亞洲太平洋地區成立集體安全體系的構想，美日兩國以在軍事、經濟等各方面的力量，應具有主導的能力，美日若能發揮兩國在軍事及經濟合作上的力量，則可防止日本為求國防安全而加強軍備的舉動，並可防止可能因此觸發的區域軍備競賽，繼而促使東亞諸國，特別是俄羅斯與中共，認真考慮亞太地區集體安全的可行性，俾使各國均能和平互助以促進經濟繁榮。準此以觀，步向平等合夥的美日關係，在後冷戰時代或有更大於冷戰時期時的時代意義。

^②Funabashi, op. cit.

U.S.-Japan Relations and the Situation of Northeast Asia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Vincent W. Chen

Abstrac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has not helped in bringing about the stability in East Asia.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wo Koreas and issues of the possible possession of nuclear weapons by North Korea are still a major factor affecting the stability of Northeast Asia. The Russo-Japanese disputes in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 must be solved peacefully in order to promote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Japan and Russia. In addition, mainland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ilitary modernization will to some extent affect the situation of the region. But, due to the lack of a multilateral dialogue on politico-security matters among all the nations in the region are worried about Chinese move in the future.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the future stability of Northeast Asia may depend on the U.S.-Japan alliance. Both countries should consult one another about issues concerning the situation in Northeast Asia. In regard of promoting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the region and establishing a mult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the U.S. and Japan should take a more positive and coherent approach. In doing so, the U.S.-Japan alliance will contribute to increase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for the region. U.S.-Japan rela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will be more meaningful in contributing to the stability of the region than it was in the years of the Cold War.

